

“综合国力”研究小考

厦门大学 张兴国

综合国力的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社会。从有关文献记载看，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综合国力问题的研究，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如管仲、商鞅、韩非、孙子等思想家在其著作中就都已有综合国力内容的论述。管仲在《管子》的《问篇》中就有70多个提问纲目，这些纲目可归纳为军事力量、官员情况、士人情况、人口迁移、就业分布、下层贫民和道德行为等七个方面。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综合国力的调查提纲。商鞅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开阡陌封疆土、废井田除世禄、促耕织、按军功授勋等一系列增强国力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治国之道和强国之本就是发展农业。韩非提出了综合国力比较分析的最初方法，认为国力对比的内容应该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即天、地、物、人各方面。孙子是第一个从战略性和综合性的角度认识综合国力并将综合国力诸要素综合运用到战争中去古代思想家。他在《孙子兵法》一书论述战争制胜的因素中就包括有“道、天、地、将、法”等项。所谓“道”就是人心和正义的主观因素，“天”与“地”即自然环境因素，“将”与“法”则是指军事因素。此外，《孙子兵法》还强调了“财”、“费”、“货”、“用”等经济要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孙子的这些论述，可称得上是当代关于决定一个国综合国力基本构成要素的思想萌芽。

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排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不十分重视。这段时期有关综合国力论述的主要著作有明朝邱浚（1420—1495年）的《大学衍义补》和顾炎武（1613—168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大学衍义补》论述了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等方面的手段，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国情国力方面的论述。作者认为人口在综合国力中起决定作用，考察一国人口不但可知一国的强弱，甚至连“成功盛衰之故、治乱安危之兆”均可由此知之。《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介绍各地地理状况、风土人情、物产分布等各方面情况的国情著作，在叙述国情时，也阐述了综合国力的一些问题。

在欧洲，早期的国情国力研究起源于古希腊时期。那时各“城邦”之间频繁进行的战争使不少学者关注到国情国力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的《城邦状况》是最早描述各国国情国力的专著。该书在努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各城邦的历史、政治制度、公共行政、经济状况、艺术、科学与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比较综合考察。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势比较思想。该思想对后来德国的“国势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国家形成与变化的“四因论”，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这与国力论的体系是颇为相似的。

在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神学统治了思想界，科学受到压制。直到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欧洲出现了许多城市共和国才得到复兴。这些共和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需要经常研究当时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对各国的国情国力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和国情国力思想在欧洲大陆又兴起，并产生了许多国力研究学派，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实用政治学派”与“国势论学派”。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介绍各国国情国力的书籍。这些研究为近代欧洲综合国力研究奠定了基础。

欧洲近代的综合国力研究主要有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国势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学者康令，代表人物除康令外，还有阿享瓦尔和斯勒兹。国势学派主要研究那些能够左右国家繁荣的事项，也称为“国家显著事项”，并搜集多国资料进行比较，以满足当时政治家们的需要。他们对综合国力系统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康令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出发，提出了决定国家重要事项的四个因素：国家的土地和人口（质料因）、国体和政体（形式因）、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力量（动力因）、建设国家的目的（目的因），并解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将国力的表叙提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斯勒兹建立了一个类似具有现代动力系统思想的考察，包括基本力即一国的土地、人口、生产物和通货四方面的情况；结合即是国家政权对基本力的组织；行动即是国家政权在一定目的下对基本力运用，这与现代综合国力论的思想已经非常类似了。

“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是英国的威廉·配第。他的代表作《政治算术》中运用大量的实际统计资料，对英、法、荷三国的国情国力作了系统的数量对比分析，指出了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并最后得出了英国能够超过荷兰和法国的结论。从方法论上来看，国势学派注意对实际资料的搜集，注重从整体上对国家显著事项进行比较和说明。其比较的方法主要是文字记叙式的。而政治算术学派则采用在当时看来比较特殊的方法即总体数量对比分析方法，“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①问题，…借以考察在自然中可见根据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综合国力研究的发展和现代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也是现代统计学发展过程中的两大主要流派，可以说近代综合国力研究和现代统计学的早期发展是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

现代综合国力研究是指本世纪以来的综合国力研究。现代综合国力研究的特点是非常注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研究综合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愈演愈烈，出现了两种具有战略指导作用的国力论思想。一是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海军战略论”，认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是其制海权和海军实力的大小。另一位是英国学者麦金德，提出具有丰富资源和人力的内陆国家，其国力具有较强优势。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对综合国力进行评价的两种不同的观点。

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继续促进有关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的理论研究。这段时期综合国力研究的特点，一是注意综合国力体系的建立，从人、财、物、体制、军事力量等要素系统地分析综合国力；二是对综合国力的研究由定性的探讨逐步向定量的研究转化。这是综合治理国力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 J. P. 考尔、威廉·富克斯、R. S. 克莱因。现对他们的研究作一简单介绍。

J. P. 考尔将综合国力分解为人口、国土面积、钢、能源消费量、国民生产总值、军事实力六个因素，并对它们赋予不同的权数，先计算出各国的这六个指标占世界总额的比重，然后根据给它的权数对这些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即可计算出综合国力指数。

威廉·富克斯以生物学的观点，即根据生物发展过程中自然增长率的变化，选择了类似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数学公式作为测算国家实力增加变化的公式：

$$M_t = [(M_s)_t + (M_e)_t] \cdot (1/2)$$

$$M_s = P_a \cdot S_b \quad M_e = P_a \cdot E_b$$

其中 M_s 为综合国力指数, P_a 、 S_b 和 E_b 分别为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的增长速度, t 为时间因素, M_s 为按钢产量和人口合成的指数, M_e 为按能源产量和人口合成的指数。

富克斯的国力方程是第一个用动态测算的方法来评估综合国力的方法, 这相对于以往那些静态测算的方法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其缺点是过于粗糙简单, 只包括人、钢产量、能源产量三个因素。富克斯本人利用该公式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变化情况进行测算。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十分庞大, 所以富克斯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成为世界之最。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 现任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克莱因在 1975 年出版的《世界权力的评价》和 1980 年出版的《80 年代的世界权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两本书中, 提出了一个对国家实力加以综合测算的公式, 这就是著名的“克莱因国力方程”, 其表达式是:

$$P_p = (C+E+M) \times (S+W)$$

其中 P_p 为综合国力, C 为基本实体, 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构成, 根据事先给定评分标准打分, 满分为 100 分。 E 为经济能力, 满分为 200 分, 用 GNP、能源、关键性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粮食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六类指标分别计算得分。 M 为军事实力, 满分为 200 分, 根据一国拥有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分别评估, S 为战略目标, 指在国际环境中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和要保护的国家利益, W 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 反映一个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 S 和 W 的值要由具体的定性分析来确定, $(S+W)$ 的最高值为 1。将 $(S+W)$ 这一精神要素与 $(C+E+M)$ 这个物质要素总和相乘, 即得到一个国家国力的总值。

克莱茵对综合国力的评估方式对以后有关综合国力的定量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以后许多学者提出的综合国力评估公式仍未脱离他的国力方程及计算模式。然而, 该方程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评分标准缺乏理论上的支持; 其次, 这是一个静态的计算公式, 不能从动态的角度反映综合国力的变化。

80 年代后期, 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也是很有特色的。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了由三个侧面立体构筑的综合国力概念。三个侧面分别是: 国际贡献力、生存力、强制力。有 15 个构成要素, 覆盖了近 100 个指标, 用加权算术平均和比较评分的方法计算综合国力。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非常重视非军事因素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邮 编: 361005